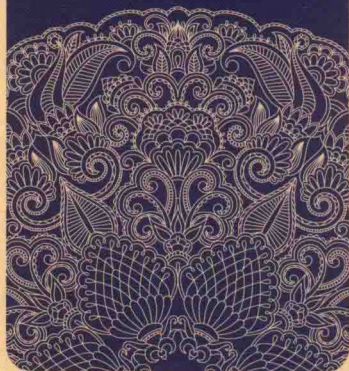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追寻《论语》的前世模样

吴人 著

追寻《论语》的前世模样

吴人 著

●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寻《论语》的前世模样 / 吴人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5535-0362-2

I. ①追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研究 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7469 号

出 版 人 王 刚
特约审读 金文明
责任编辑 黄慧鸣
装帧设计 汤 靖
封面设计 张胤俨
责任监制 陈 平 刘 学

书 名 追寻《论语》的前世模样
作 者 吴人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邮政编码 200020
网 址 www.cshwh.com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一版 201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5535-0362-2 / I.110
定 价 30.00 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电 话 021-64366274

自序

就为了一个目的，差不多花了六年多时间，把十三经仔细地“啃”了一遍，加上原先“啃”过的《国语》、《管子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……可以说，几乎把现有的先秦著作全都认认真真地“啃”了一遍。我说的“啃”，并非虚张声势，凡“啃”过之处，都有当时划下的无数红杠杠，以及诸多批注为证。像十三经中的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，还“啃”了两遍，为什么？那是我觉得这些所谓“三礼”的玩意儿，虽然现在大多已用不着了，但在当时却是主导社会主流意识的经典。用个不大恰当的比喻，好比现在的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乃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，如果要研究现代的历史，那非对其深读不可。不过，如我也冠之“研究”而读上述这些书，似乎有托大之嫌。其实，我只不过如前面说的那样，就为了一个目的——写一本名为《追寻〈论语〉的前世模样》的书。

可历来为《论语》写的专门之作多矣！说车载斗量为之嫌少，说汗牛充栋实在不多，曾有人作过统计，唯一万五千字左右的《论语》，历代为其注疏、评述的文字已超过二万亿！且

还有不少人在夜以继日地为其添枝加叶。既然已有如此浩荡的场面，如我这样的小人物，理应识相，大可不必再轧这样的闹猛。不过，如果仔细甄别，却会发现追溯《论语》的原委——直白说，以《论语》为蓝本，而发掘孔子儒家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专著却是寥寥无几。近人杨树达的《论语疏证》堪称非凡之作，陈寅恪对其十分推崇，极力称道：“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《论语》有关者，并间下己意，考订是非，解释滞疑，此司马君实、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，乃自来诂释《论语》者所未有，诚可为治经者开一新途径，树一新模楷也。”（杨树达《论语疏证》陈寅恪序）不过，陈寅恪说的“乃自来诂释《论语》者所未有”似乎有误。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就说过：“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，考证《论语》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内篇二·言公上》。按，王伯厚，即王应麟，南宋学者，著有《困学纪闻》、《玉海》等。）再一，读杨树达的疏证，固然精彩非常，但按陈寅恪说的“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，若不取事实以证之，则成无的放矢矣。圣言简奥，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著之，则为不解之谜矣”（同陈寅恪序），又似有点美中不足。那是因为杨的不少疏证，采撷的是汉以后的史料，也就是说用后史来证明前史。这当然无尚不可，但以我的一孔之见，像这些疏证，用来表明《论语》对后世的影响，效用显而易见，然而用来索证孔子儒家思想的由来，则说服力比较弱化。当然，杨的疏证或本来就是一举两得，只是我太过注重一个方面，以致偏见。

除杨树达《论语疏证》以外，陈来的《古代宗教与伦理——

儒家思想的根源》也是其中上乘之作。他所列举的诸多前儒家思想的史实，皆格物穷理，毫厘不爽。但作者着重讲的是古代宗教与伦理，并非为专门论证孔子儒家思想的根源。另外据我所知，再没有人写过这类专著。这便使得我陡生野心，其后一直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想写一本关于孔子儒家思想由来的书。可自以为读了不少书，已有充分准备，不妨动笔时，却又不自觉害怕起来：一是以一介草根之见，谓之“再没有人写过这类专著”的说法，是否靠得住？万一这类专著其实多的是，并早已把《论语》的前世模样描绘得清清楚楚，那我岂不成了画蛇添足？二是这类专著确实不多，但如我写的这些东西，自以为独一无二，其实却是辽东白豕，那又如何是好？好的是草根之流，免不了屈居下流的自卑，不像有的大师，硬要摆出一副自家学问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，一旦被人揭发错误，便暴跳如雷，如同被掘了祖坟一般。草根不一样了，说得好听一点，他们知道自己缺少学问的根基，便很有自知之明，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教育；说得难听一点，谓之草根，不免犹有痞子气，无知无畏，即便遭人痛批，却也无所谓，不妨拉开嗓门，直呼一声：阿拉错了，改了不就是嘛！

如我自觉属于后者。这样说来，我也用不着有什么好害怕了，大可放心地先作一些交代：拙作的目的是对《论语》探本穷源，因此对《论语》的注释和分析简略从免，主要是辨析《论语》的记述，追溯孔子儒家思想的由来。具体地说，即用“以史证经”的方法，来分厘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

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管子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著作中记载的有关公元前 551 年即孔子诞生前的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于是选择作为佐证，用来辨析表明前孔子儒家思想的生存形态。方法是把《论语》分为仁、忠(义)、孝(悌)、礼(乐)、德(信)、学(智)六种归类，根据这六种归类，从以上古籍中寻找摘录与之相关的记载，主要是言论。比如仁，在孔子之前，这些古籍中是怎么记述的，又有谁说过有关仁之类的话。着重摘录的古籍是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及《郭店楚墓竹简》、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、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和《夔公盨铭文》。并针对摘录，作一总体“说明”。然后又根据归类，分别叙写仁、忠(义)、孝(悌)、礼(乐)、德(信)、学(智)在孔子之前的概况，主要引用的古籍是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史记》等。与“说明”不同的是，“说明”是对前孔子儒家思想的粗略梳理，分别叙写的仁、忠(义)、孝(悌)、礼(乐)、德(信)、学(智)，则是比较详细地列举史实，以揭橥前孔子儒家思想的客观存在。

由此不难发现，这样的写作目的，并非学术评论，更不是为熬制当下十分时髦的心灵鸡汤，只是力图还原一种历史的真相。不幸的是，历史的真相常常会给很多人带来情感上的失

落，而引发不快。像李零的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〈论语〉》，刚刚付梓出来，便被许多人骂得狗血喷头。为什么？就是把孔子写作“丧家狗”！骂人为狗，本是里巷秽语，且又骂的是圣人，那还了得！其实，非也。在孔子那时候，人，犹有君子小人；狗，则全为英雄豪杰！这只要看看傅玄写的《走狗赋》就明白了。至于丧家之狗，究诸司马迁的说法，实为丧失了家的英雄！再说李零又为什么要借用“丧家狗”为书名，正是以名正义，设法还原孔子的历史原貌。或者说，还原一个活着的时候的真实的孔子，不是那个死了之后，被一代代统治者经过装扮的孔子。

无疑，这又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。如是看来，像我这样的拙作，也不大会受人欢迎的。为此，有朋友就曾经劝过我，何必花那么大的力气，去写一本自己都知道不受欢迎的书？像于丹那样多好，讲古人的故事，激励现代人的生活。可我不是教授，当然也没有于丹那样的本事。说真的，草根之流多半性情粗野，而写这样的书——熬制心灵鸡汤的活儿，特需要把握机巧。机巧之一，便是要在鸡汤里面添加诸多的作料，看似简单，实在大难。比如从前的《论语讖》，一心想把孔子说成非凡的圣人，于是既力证“叔梁纥与微在祷尼丘山，感黑龙之精，以生仲尼”；又道明“子夏曰仲尼为素王，颜渊为司徒，子路为司空”（参阅浙江图书馆藏本），说来全都凿凿有据。

显然，这所谓的“讖”，便是古人为熬制心灵鸡汤所用的特别作料。虽然今天看来已让人很难相信，但在东汉的时候，却是风光非常，几乎人人深信不疑。比如最高领导人刘秀就很好

这一口，像这样的鸡汤非服不可。后来虽然渐替不兴，但名重天下的高级知识分子陶弘景，还为梁武帝显了一手造讖熬鸡汤的绝活。诸如所述，在《后汉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梁书》中均有如实的记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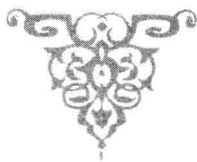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样说，并不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光彩，相反，倒觉得这是古人对自然人生的一种认知。从学术上讲，则是一种流派。不信，检《后汉书》的桓谭传、郑兴传、贾逵传，便可知道那时候的儒学研究是分为两派的，一派是讲讖的，一派是不讲讖的。而且讲讖的乃官方正统，是为显学。像郑兴硬是和最高领导辩白：“臣不为讖”（《后汉书·郑兴传》），就差点被砍了头！可见学派不同，形同水火。不过，或是有人会指责我说得不对，以为那是图讖之学，与儒学则根本不搭界。但我以为搭界的，“自中兴之后，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讖言”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），史书记载明明白白。后来蔡邕力主刻六经于石碑，以正视听，就是为儒学拨乱反正之举。而他说的“俗儒穿凿，疑误后学”云云（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），当非凿空之谈。所以说，像《论语讖》这样的心灵鸡汤，虽然现在已当作“怪语很多，可存而不论”（章太炎《国学述闻·今古文之分》），但在当初确实是风光过一番的。

坦率地说，我固然没有熬制心灵鸡汤的本事，但自觉也不愿去做这一路子的学问，尽管心灵鸡汤在目前确是很时髦，很受欢迎，而且已没有一点讖的味道，着意换作的励志，分明意气风发，只是内里的流向并无质的变化。或是出于偏见，我看

到现在有人把《论语》熬制成心灵鸡汤，就会想起明朝李贽说过的两句话：“记《论语》者，圣手也，读《论语》者，从来都是瞎子。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李贽注）不管这样的偏见会被多少人咒骂，我总觉得做学问，可以株守一门学派，但不可被某种思想拘禁为其效力。章学诚说得好：“夫经为解晦，当求无解之初；史为例拘，当求无例之始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内篇·书教下》）如果所做的学问连“无解之初”都还没有弄清楚，就事先陷于某种思想的框定，那学问的本质意义就十分虚弱，所谓“史意”、“史德”，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好了，自序如是，连同拙作，一并献丑。唯盼读者指正赐教。最后要申明感谢的是：感谢浙江图书馆的王巨安先生、海宁图书馆的汪莉薇副馆长、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的朱一红女士，分别为我提供的帮助；感谢金文明先生于百忙之中，为我审稿；感谢曹锦炎先生、周永良先生极力向上海文化出版社推荐拙作的出版；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为之付出的经营劳作；特别要感谢的是，有意买了我这本拙作的每一位读者，再次谢谢。

吴人写于杭州旧居
壬辰春分



目 录

自序	1
前世模样之一：仁	1
前世模样之二：忠(义)	23
前世模样之三：孝(悌)	47
前世模样之四：礼(乐)	70
前世模样之五：德(信)	105
前世模样之六：学(智)	150
孔子儒家思想探源	171
——兼对“先秦古籍摘录”的说明	
先秦古籍摘录	208
跋	295

仁

仁，按《说文》的解释：“仁，亲也。”观《诗经·郑风·叔于田》：“叔于田，巷无居人。岂无居人，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”毛诗注疏这个“叔”是共叔段，即郑庄公的弟弟，这似乎不大可信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这个共叔段并非“仁，亲也”之辈。但《诗经·齐风·卢令》又有：“卢令令，其人美且仁。”可见以仁作为对人亲善、慈爱的形容字，早就已经定型。那么，《诗经》中的仁，又是从何而来？当然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。《尚书·舜典》中说的“柔远能迩，惇德允元”，或就有仁的含义。然而仁作为《论语》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概念，孔子又分别作了这样的辨析：

樊迟……问仁。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

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

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讱（谨慎）。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请问之，曰：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显然，这些辨析表达了仁有多种含义。但从《论语》看来，不管具有怎样不同的含义指向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它们都是在“爱人”的基础上产生的，如果没有爱人之心，也就很难对别人做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？观“仁，就是爱人”，既没有哲理，也没有悬念，现在只要受过中等教育的人，恐怕谁都知道。可就那么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，还用得着被司马迁称为“可谓至圣矣”的孔子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郑重其事地拿来开导弟子吗？说句笑话，假如孔子的弟子连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是由“爱人”为支撑的道理都不懂，那水平也太那个了！

通检历代《论语》的注本，堪称汗牛充栋。但对此的解释，无论是引经据典的注疏，还是有条有理的阐发，都是围绕孔子如何具有非同寻常的爱心大发议论，高唱颂歌，却鲜有说明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？而孔子这“爱人”之说，又实在是很值得推敲的。当然，有人会说，孔子不就对子张说过，仁须有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这用来解释“爱人”的目的

所为，不正条理分明吗？这没有错。可我以为还另有原因，也就是说，孔子之言，在表明与诸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相互关系背后，还另有现实意义。

什么现实意义？检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·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辞以近市得求讽公省刑》，或许便可以明白：

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“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嚣尘不可以居，请更诸爽垲者。”晏子辞曰：“君之先臣容焉，臣不足以嗣之，于臣侈矣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。敢烦里旅！”公笑曰：“子近市，识贵贱乎？”对曰：“既窃利之，敢不识乎？”公曰：“何贵何贱？”是时也，公繁于刑，有鬻踊者。故对曰：“踊贵而屦贱。”公愀然改容，公为是省于刑。

（齐景公想为晏子换个住宅，说：“你的宅居靠近集市，潮湿窄狭，喧扰不堪，不可居住，得换一个干燥明亮的地方。”晏子辞谢说：“这是我先人住的地方，我本来还没有资格继承，现在能住已经很奢侈了。再说我住得靠近集市，早晚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对我颇有益处，怎么还要麻烦有司来为我迁换新居！”景公笑着说：“你近在集市，知道东西的贵贱吗？”晏子说：“既然有所得益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”景公说：“那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呢？”于时，景公正推重刑罚，被刖足的人很多，便有专门制作出售为受过刖刑而断了脚的人穿的踊。晏子于是回答说：“踊贵而屦贱。”景公听了脸都变了色，为之减省了刑罚。）

呜呼，踊贵屦贱，岂不令人毛骨悚然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呀？动不动就施刑把人的足断了，以致断足的人暴多，居然多到出了一个为其制作“踊”的行业！这样毫无人性地滥施刑罚，分明把人根本不当人，斩人之足，如断鸡爪鸭脚！其黑暗、残暴、冷酷的状况，恐怕让现在很多人义愤填膺之余，又觉得不可理喻，怎么能这样对待人的生命！？可实际上在当时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，恰恰是一种“正常”现象！说白了，在那时候除了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这个贵族阶层之外，包括大部分士，在实际生活中可以说都不是人！只是围绕着这个贵族阶层服务的一群形同牲口的奴仆。我这样说，或有人批驳不对！因为按照《仪礼》来看，十七种礼就有五种指名道姓为士之礼，士的地位显然是非同一般。而《礼记·王制》更交代得明白：“王者之制禄爵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五等。诸侯之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凡五等。”但不知道《仪礼》中记载的所谓士礼，像《士冠礼》是否后来战国时被人所添加的礼仪礼节？也不知道《王制》中说的“士”，是否为武士（《参阅王凤美、周苏平、田旭东《春秋史与春秋文明》》）？我差不多读遍了现有的先秦古籍，以为在春秋时期，除管仲、宁戚、曹刿等这样极少数的士有所作为，也非常风光以外，士，实同庶民相差无几。可以说，现有的史料无法证明士在春秋，及春秋以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。士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，参政执宰，英雄迭出，所谓“得士者富，失士者贫”（扬雄《解嘲》），盖为战国时勃发的时代风潮。

再观《论语》，有关士的议论有十多处，但像孔子说的“切慙慙，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“志士仁人，

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曾子说的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以及子张说的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，这都与“君子”有关，也就是说，所谓士，务须具备作为君子的人格。这分明是具有很强目的性的一种追求，其原委正是出于改造自身社会地位的实际需要。以我之见，春秋之士，就如《穀梁传·成公元年》说的“古者有四民，有士民，有商民，有农民，有工民”，这恐怕才是春秋之士的实况：夫士者，实民也！诸如这样的“四民”，当时从根本上都缺少自身的生存权，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。所有的刑罚，都是为他们制定的，谓之“刑不上大夫”的反面，就是把大夫以下的人视同草芥。君不见，于斯之“刑”，乃是周家天子颁布的官刑。因此，只要看其中哪个“四民”不顺眼，便可将其脚砍下来，并非齐国的特权。《尚书·吕刑》中的劓、剕、刵、黥、大辟五种刑罚，正是从周天子到各大诸侯用来统治对付众多“四民”的法典，所谓踊贵屦贱，其实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。显而易见，我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再来解读孔子的“仁，就是爱人”，便觉得端以知末，其中的现实意义，也就非同一般了。观《说文》专门释人为“天地之性最贵者也”，正一丝不苟地阐发了孔子的儒家思想。可后来韩愈倡导“博爱以为仁”（《原道》），程颐却以为“非也。仁者固博爱，然便以博爱为仁，则不可”（《近思录·道体》），这是“历史背景”不同引发的一时议论，还是宋理学专门对儒家思想的改造？这是大家不可忽视的。

我们知道，《晏子春秋》中说的这段史实，在《左传·昭公

七年》中也有相同的记载。可知孔子那时刚好十八岁，正值血气方刚之年。虽然他当时不可能知道晏子与齐景公这样的对话，但对就发生在近邻的“踊贵屨贱”的故事，大概不会一无所知。再说，于时鲁国也不会没有被砍掉了脚的“四民”，因此孔子提出的“仁，就是爱人”，当不能说与此无关，但也不会就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。以存在决定意识来说，我以为他身处的鲁国对其更具刺激性，更是促发他大讲特讲仁的客观原因。纵观《春秋》，对照“三传”，可知鲁国的仁爱实况，历来都不怎么样。远的暂且不说，就说和孔子同时代的鲁昭公。据史载：鲁昭公自打十九岁继嗣鲁国国君后，就和实际执掌鲁国政权的“三桓”不和，为此力图除掉季平子，以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（参阅《春秋·公羊传》）。殊不料力不从心，反被三桓联手逐出鲁国，在外流亡七年之久，最终死于异国他乡。这里姑且不论其中是非曲直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这样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，实际上都是在同一家族内发生的。按辈分季平子是昭公的叔祖父，这在现在看来已没有什么，可在那时候像这样未脱五服的至亲，正是“尊尊亲亲”不可随便冒犯的。这种萧墙之内的残酷搏杀，对孔子来说，显然不可容忍。他极力主张“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”（《中庸》），为之联系他对叶公说的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可见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以事论事而已，恰好和他的“爱人”之说一脉相承。然而由“隐”而联系“爱人”，仅仅把它当作孔子对“三桓”的不满，显然意义并不大。如果说这正是孔子对现实社会提出的一种抗衡，从中呼吁当权者善待每一个人的生命，由是发掘其“爱人”的人文价值，那就显山露水，大为可观了。